

南下人川办小学

陈探许

1949年春天，为支援全国建设，大批晋绥军区的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广大南方建设的任务。

为解决随军南下学龄儿童上学问题，1949年8月，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决定在临汾成立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凡随军南下团级以上干部子女，均可入学。不久后，位于离石大武镇的贺龙中学附属干部子弟学校部分老师和学生并入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一起准备南下。

1949年6月16日，学校组织了8辆大车和骡马驮子，把老师和孩子们从大武镇送到临汾东街，由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申国藩校长和指导员李化芝接收了他们。全校师生员工近120人，最小的学生六七岁。为了让孩子们穿暖、吃饱、不出事，上好学，学校安排人到天津为孩子们采购衣物和糖果。为了让南下的干部们放心，留守处又调配了十多个保育员，平均一个保育员照顾十来个孩子。南下干部团大部出发后，留守的学校就搬入临汾煤炭巷原晋绥军区政治部空出的大院办学。

1950年5月12日，留守处全体人员由政委乔钟灵带领，在部队护送下从临汾出发南下。当时的南同蒲路还是窄轨，而且被战火破坏严重，只能一边走一边修。队伍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大家不分老幼，不分男女，在没有座位和照明的拉煤闷罐车里席地而坐，每节车厢都塞得满满的。一路走走停停，到达陕西宝鸡后，铁路已经没有了，接下来的路程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留守处全体人员不得不停留在宝鸡，等待筹集去成都的交通工具。经多方努力，终于筹到几辆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军用卡车。几天后，这支特殊队伍再次出发。进入秦岭山区后，车队沿途不但要修整被破坏的公路，还要防备小股土匪、国民党溃散部队、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因为经常需要停下来疏散隐蔽，待敌情消除后再继续前行，所以车队前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行进几十里，经过7天7夜，才从宝鸡到达成都。

据当时一同南下的刘惠民老师回忆：“队伍不能抗民，夜间只能住宿在学校教室或庙宇里，有时还住在街边上。带着孩子连日坐车颠簸，一路的劳累和紧张非同一般。”

随着南下队伍相继到达成都，南下干部们很快投入各项工作。当时成都刚解放，国民党特务活动还很猖獗，工作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南下干部们都忙于接管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有关部门于是决定，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实行读制，到上中学年龄的孩子入城就近读书，不再建子弟中学。

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校名改为川西育才小学，使用教育家陶行知在四川创办的育才学校之名，意为这所学校要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为加强学校领导，任命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林若为保育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学校专门挑选了一批政治上可靠、业务较强的教师到校任教，还配备了医务室工作人员和一批保育员。

南下干部子女的到来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不久，学校发生了特务袭击执勤战士事件，特务被当场击毙；1950年8月，学校迁到位于江汉路原唐中学校的校址后，又抓获一个企图半夜放火的特务；特务骚扰学校、打冷枪等破坏行为不时发生，学校于是加强了警戒，安排教职职工值班，并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夜间巡逻。

1957年，川西育才小学更名为江汉路小学并停止读制招生，育才小学的光荣使命就此结束。从育才小学毕业的学生们，后来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红色记忆

在古交、娄烦、静乐一带，山苍水碧，林茂泉幽，是古代优良的自然牧场。先秦时期这里是游牧部落楼烦人的活动范围，两汉至隋，各朝均在此设置养马场。欧阳修认为，这一带“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草软水甘，最宜养牧”。《读史方輿记要》载：“下马城，(文城)县北六十里，接静乐县界，相传北魏孝文帝往来避暑下马处。又马兰城，在县北九十里孔河上，本名马兰村。孔水南流经此，东注于汾，汉、魏、北齐皆尝牧马于此。”马兰城，即今古交市马兰镇，孔河今称屯兰河。孝文帝来此避暑有待考证，但下马城村一带在古代确为一方胜景。隋代大业八年(612)，隋将西突厥一部迁移到楼烦(今静乐县)，可见今静乐、娄烦一带当时适合突厥人的游牧生活。

唐代前期在汾河上游置楼烦监、玄池监、天池监，为唐朝军马的来源地之一。今娄烦县的涧河古称监河，因唐代在此置楼烦监牧所故名。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末置楼烦县、宪州，即今娄烦县一带。“宪州，下。旧楼烦监牧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领。贞元十五年，杨钵为监牧使，遂专领监司，不系州司。龙纪元年，特置宪州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

唐代实行的是马政独立运行机制，国家的牧马之地主要集中在陇右48监，即为陇右马多而地狭，便将国家牧场向东、向西延伸，河东道岚州东部的楼烦、玄池、天池牧场划入国家牧场。唐朝的国家牧场由设在陇右的太仆寺少卿统一管理，第一任太仆寺少卿是河东马邑人张万岁，他管理全国马政20多年，卓有成效。

青主舍地奉龙池

郝岳才

傅山先生曾著《上兰五龙祠场圃记》，现有拓片存世。其中隐藏着傅山敬重的人物。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曰：“岳岳即平，往岁读书虹巢，数数过上兰五龙祠。祠东南有余家地二亩，祠僧普烈请为场圃，余许之。复过上兰，普烈将筑墙于此，嵌石于上，复请余记之。时普烈适新住城之报恩寺。寺，龙池先生像在焉。先生，当日文士，死焉。亭树非其有，赠答吟什非其有，子孙也非其有。余约普烈佛佛之余，以香火供先生焉。烈能听余，是余以二亩地为龙池先生易香火也。奇奇！傅山。岳岳既平，琮玉斯韞。考祥亡羊，题楨木折。有位无人，甫田围隄。巨室工逸，七贤一遁。”解读碑文后隐语可知，该碑记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辛巳。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已经将上兰五龙祠场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早在数年前，傅山即舍地于五龙祠为场圃，又为何在普烈往报恩寺前写此碑文呢？原来，五龙祠住持僧人普烈曾一度在窆大夫祠旁保安寺为僧，傅



名都自古并州

汉钟离与河东道情

韩 棚



河东道情演出

河东道情起源于古河东，分布于山西晋南一带及黄河两岸，源于道教，在过去是以说唱的形式演唱，故称河东说唱道情，民间俗称为八仙班。

清代中期，河东说唱道情逐渐传播至河南省西部、陕西省和甘肃省等地传唱。新中国成立后，河东说唱道情发展到巅峰，2006年，河东说唱道情入选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相传，道教传说中八仙之一汉钟离少时父母双亡，由于生活困苦，他便出家修行。20岁那年，汉钟离四处云游化斋，遍走九州。一日，行至河东蒲州渡口，正准备乘舟过河时，遇到山洪暴发，船不能行，便住了下来。翌日早晨，汉钟离漫步在河岸的林荫小道上，耳闻树上百鸟啼鸣，不禁轻敲渔鼓，开口唱道：“自北山至蒲州坂一路艰难，鸟雀儿怎知晓人间愁怨……”

山在窆大夫祠虹巢读书期间与其多有交往。因此普烈住持五龙祠后，才敢于开口将祠东南傅家二亩地请为场圃。傅山许之，但也附带条件，那便是佛佛之余以香火供龙池先生。普烈自然是言而有信，但在即将离开五龙祠时，请傅山作《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并刻石于上墙，也是良苦用心，以使后任住持践行承诺。由此，《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得以保存，承载了一段傅山与五龙祠的佳话，保存了傅山青年时代的行草书作。

其实在上述佳话之中还另有佳话，龙池先生为谁？傅山先生何以舍地为其易香火供奉？清宣统间罗振玉修纂《傅青主先生年谱》时也存此疑问，曾以王道行试解，却未敢定论。那么这位深受傅山敬仰的龙池先生到底是哪位文人呢？

纵观傅山诸版《霜红笈集》乃至2016年新编《傅山全书》等相关文献，名字、字号与别号称龙池者凡三见：曰王道行者，字明甫，号龙池，阳曲县人，明万历、清乾隆《太原府志》与清康熙、道光《阳曲县志》均有传记与艺文收录；曰张燠者，字孔昭，号龙池，清顺治八年(1651)中举，但立志不仕，淹贯经史，著述颇丰，与傅山先生多有交往；曰龙池主人者，身份难以确定，2016年新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二《杂文·国变论》中记之。

鉴于傅山《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所述龙池先生早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前即已离世，张燠与《国变论》中龙池主人均可排除在外，因二人仍活跃于1644年“甲申国变”之后。而王道行其人，在2016年新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一《家训·杂训二》中，记录有“晋中能书者”老诸生王道行洛

南，“最能真书，一笔一画，端正可敬，不知者曰版也。”卷四十五《杂记》则专论《王龙池字》：“王龙池道行以能大书名，实无足观也。唯与钱纲之先生作‘毋不敬’三字，尺三四寸大，支离可爱。以其作字时无作字意在中。纲之又其后辈，故能不束縛耳。”显然此王道行非彼王道行，同名同姓耳！傅山敬重的“龙池先生”乃后者。

王道行弱冠即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进士，历任邓州知州、大名同知、苏州知府、应天副使、陕西参政、河南按察使，官至四川布政使，所至有声。归家三十余年，惟杜门著书，至陈民间利病。如议开三门、复书院、革说帖之诬、雪青衿之冤、罢一切诸行、库役斗级、里长之苦，当道重之。王道行一生，精儒学、崇佛法，雅山水，文坛宗主王世贞将其与石星、黎民表、宋多燧、赵用贤并为续五子。归家后在太原府城东南隅落桂子园，成著述结社觞咏之所，著有《桂子园集》。李维祜在《桂子园集》序中如此称道：“太原方伯王先生……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敛其华，而藏名之士自失焉。”参与《三立祠》建祠间撰《三立祠记》，与五台山、南十方白云寺、晋祠奉圣寺僧人以及文人雅士交往频繁，撰《太原重修奉圣寺碑记》《重修白云寺碑记》与组诗《游五台山》等，著述颇丰。

尽管傅山对王道行书法不大以为然，但不能据此而低估傅山对王道行的崇敬。毕竟在太原读书人中，王道行是一位“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的前贤，于太原一方水土有着突出贡献。罗振玉的判断是准确的，傅山先生舍二亩地易得香火供奉之文士即王道行。青年傅山早在明崇祯年间即能有此义举，非名士高士不能为！

锦绣太原·人物篇(13)



国内闵氏宗祠有一副通用楹联：“德行纯全，单衣顺母言无间；志操高洁，肝脾累令寓移开。”

上联指的是“二十四孝”中“单衣顺母，鞭打芦花”的闵子骞，下联指的是汉代贤士闵贡。

《后汉书》卷五十三《闵仲叔传》载：“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扇而去。复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沔，以寿终。”

闵贡的经历在魏晋名士皇甫谧著《高士传》中亦有详细记载。

闵贡与太原同乡周党交好。周党是东汉逸民隐士，年少时父亲去世，成年后他把千金家产散与族人，只身离家。王莽篡位，周党托疾杜门不出。建武年间征为议郎，受光武帝刘秀礼遇。坚辞不仕，隐居著书。时人称为“贞介士”。就是这样磊落高洁的周党，也认为自己与闵贡相比，还有差距。周党与闵贡的交往中，看到闵贡口中含着豆类食品来喝水，不忍心闵贡如此贫寒，就买些生蒜送给闵贡。闵贡接下了周党送来的生蒜，对周党说道：“我这样吃只是想省些麻烦，难道你还想给我增添麻烦吗？”把蒜放在一边没有食用。

汉光武帝股肱之臣侯霸在担任司徒(相当于丞相)时，曾聘任闵贡为官。闵贡见到侯霸后，侯霸与闵贡不淡治理国家的正事，而是嘘寒问暖，慰问一路车马劳顿。闵贡遗憾地对侯霸说：“开始受到您的任命时，我又高兴又害怕，现在见到了您，我既没有了兴奋也没了恐惧。如果您觉得我的才能和智慧不足以来谈论政事，您就不应该征召我来做官。征召我来却不问我何政事，这是错失人才。”闵贡起身扔掉召他的聘书，辞职走了。

之后，朝廷又征召闵贡出任博士职位，闵贡直接拒绝。闵贡回家后，没有回太原，居住在了安邑县(现运城)。闵贡上了年纪，慢性病缠身，生活拮据。肉食对于他的家庭，已经属于高档消费。儿子为了维持他身体所需的营养，只能每天给他买一片猪肝。就连这一片猪肝，也得看屠夫的脸色。屠夫有时心情不好，就不肯卖给闵贡家。闵贡毕竟是当地名士，又是敢于将司徒的聘任书当面扔掉的名人，地方官员也时刻关注。一天，安邑县令问闵贡的儿子吃什么饭菜？回答说：“吃猪肝，但屠夫有时候不肯卖给我们。”县令知道了闵贡买猪肝的这番窘境后，吩咐下属通知屠夫，保证供给猪肝，只要闵贡来买猪肝，屠夫都要卖给他。想必是闵贡看到家里可以每天吃到猪肝，感到奇怪。屠夫为何改变态度？询问儿子，儿子说出了事情的缘由经过。闵贡感叹道：“闵仲叔怎能因口腹拖累安邑百姓呢？”又连忙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既然无法直接拒绝地方官员的好心，那就离开吧。这就是“节士”，这就是太原人闵贡。

闵贡的这个故事在后世的《东观汉记》《龙文鞭影》等书中都有记载，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闵贡猪肝”“仲叔猪肝”“食肝烦县令”“食无肝”“猪肝累”等典故被后世引用。唐代李商隐“脱身离虎口，移疾就猪肝”；宋代苏轼“长披羊裘类严子，罢食猪肝同闵仲”，黄庭坚“闵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我其敢用鲑菜烦嘉禾”，陆游“何由取熊掌？幸免食猪肝”；清代林则徐“程缓不劳催马足，装轻未肯累猪肝”……一片猪肝的故事成为东汉以来传颂学习的典范、诗词歌赋的典故。

不以口腹累安邑

孙 琨

牧马群嘶汾水畔

李广洁



娄烦县景

母马出界的禁令已经形同虚设，河东节度使上奏请求重申禁令。“大中六年(852)六月，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李业奏：当管诸军州草马，准贞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敕文，不许出界。又准去年五月十五日，司门转牒，诸道应有草马，准敕并不命出界。今缘近日诸道差人，于当管市马，不依敕文，并收草马。伏乞天恩，诏下诸道，准元敕约勒。”由此看来，当时周边各地到河东道收购母马的很多，说明了以楼烦监为代表的河东牧场所出良马在当时颇为有名。

唐末，沙陀首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军队以骑兵为主，对楼烦监的良马一直有觊觎之心。唐中和二年(882)，李克用占据忻州、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李克用的目的是争夺楼烦监的控制权，为其骑兵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良的战马。李克用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为了把楼烦监划归河东节度使管辖，唐龙纪元年(889)，李克用上奏朝廷，在楼烦监所在地置宪州，宪州下辖楼烦、玄池、天池三县。在原来楼烦监之西一里建楼烦县城。如今，在汾河水库之西的娄烦县蒲峪村，还遗存有记载楼烦监的唐代墓碑。原来玄池监的治所下马城改为玄池县，直到宋咸平五年(1002)玄池县才废入静乐县，今静乐县的下马城村作为玄池县治达百余年之久，今下马城村内还存有唐碑。在原来天池监的旧地置天池县，治今娄烦县天池店村。李克用在河东设置宪州三县之后，汾河上游的国家牧场都划入河东道管辖，李克用达到了控制楼烦监良马之目的。后来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东出太行山争霸，楼烦三县牧场一直是其战马的供应地。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任命杨钵担任楼烦的监牧使，楼烦监不再接受河东地方官府管辖，又改由中央直管。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因为楼烦监提供的军马质量不高，各地的唐军上奏朝廷，楼烦监监牧使党文楚被追责，籍没家财。“唐元和十一年正月，楼烦监牧使中官党文楚，以供征马羸瘠，为诸军所奏，夺排。没其家财，配隶南衙。”从文献中所云“为诸军所奏”来看，当时楼烦牧场向多地的唐军提供军马。

朝廷在唐贞元三年(787)十二月颁布敕文，不许各地的母马出界，但过了60多年，到了唐宣宗大中年间，不许